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10BWXJ06)

丁秀菊 著

先秦儒家修辞研究



山东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10BWXJ06)

丁秀菊 著

先秦儒家修辞研究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儒家修辞研究/丁秀菊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4

ISBN 978-7-5607-5264-8

I. ①先…

II. ①丁…

III. ①儒家—修辞学—研究—中国—先秦时代

IV. ①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3555 号

责任编辑:董付兰

封面设计:张 荔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9.5 印张 327 千字

版 次: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2.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先秦儒家与修辞	(8)
第一节 孔子与修辞缘起	(8)
第二节 《易传》“修辞”的语义内涵	(11)
第三节 《易传》“修辞”的学科地位	(18)
第二章 先秦儒家修辞思想	(25)
第一节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儒家论立言修辞的重要性	(25)
第二节 “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儒家论修辞态度	(33)
第三节 “情欲信,辞欲巧”——儒家论修辞内容与形式	(38)
第四节 “言有节”、“言而当”——儒家论修辞原则	(81)
第五节 “知言”、“解蔽”——儒家论话语理解	(122)
第六节 “近取譬”——儒家论修辞现象	(143)
第七节 “微而显”——儒家论言语风格	(149)
第三章 先秦儒家言语修辞美学	(153)
第一节 概 说	(153)
第二节 孔子、孟子、荀子立言修辞的审美特质	(156)

第四章 先秦儒家言语风格	(196)
第一节 先秦儒家言语风格概说	(196)
第二节 孔子、孟子、荀子的言语风格	(202)
第五章 先秦儒家修辞的产生及其特色	(241)
第一节 儒家修辞产生之缘起	(241)
第二节 先秦儒家修辞特色	(272)
结语 先秦儒家修辞的现代审视	(282)
主要参考书目	(296)
后 记	(305)

绪 论

先秦特指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相当重要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周王室的日渐衰微,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势力逐渐变弱,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日益增强,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的这种更替,极大地冲击了人们固有的思想观念,推动了人们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变化和发展,立场、观点、主张各异的学术派别——儒、道、墨、法等争相问世。他们思想活跃,论辩激烈,唇枪舌剑,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烈场面,同时《诗经》、《春秋》、《左传》、《战国策》、《老子》、《论语》、《孟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经典著作也纷纷面世,从而为中国学术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哲学、美学、文学、伦理学、语言学等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几乎都能在这一时期的著述典籍中找到源头。因此,著名学者吕思勉先生说:“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①德国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则称这一历史时期为“轴心的时代”:

以公元前 500 年为中心——从公元前 800 年到公元前 200 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

在公元前 800 年到公元前 200 年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似乎建立了这样一个轴心。在这时候,我们今日生活中的人开始出现。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的兴起,这是墨子和庄子以及无数其

^①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 页。

他人的时代……

这个时代产生了所有我们今天依然在思考的基本范畴,创造了人们今天依然信仰的世界性宗教。^①

—

儒家是先秦时期众多学术派别之一,也是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最大、最深、最广的一个学术流派。“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②儒家经典指传统六经《诗经》、《尚书》、《礼记》、《乐记》、《周易》、《春秋》以及《论语》、《孟子》、《荀子》、《左传》、《穀梁传》、《公羊传》、《国语》等先秦儒家典籍。它们彼此援引,相互印证,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以《诗经》为例,其后的儒家著作就多有称引。据统计,《国语》引用《诗经》诗句及篇名达40次^③;《左传》赋诗36则、歌诗2例、引诗181句次,引孔子语(“仲尼曰”)25则,引“君子曰”85则^④;《论语》中孔子论《诗》6条,孔子及弟子引《诗》8条,其他人引《诗》1条^⑤;《孟子》也多有称引,主要论及如何说《诗》的问题并由此提出了“以意逆志”的解《诗》主张;《荀子》一书引《诗》更多,几乎每一论题及其分论点的论述,在引出结论时,荀子都要用《诗经》中的句子作为自己的论据;《荀子》一书共引现传《诗经》中的诗歌65篇次,涉及诗歌45首^⑥;等等。所以,著名学者吕思勉说:“治先秦之学者,可分家而不可分人。”其原因在于,“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凡所纂辑,率皆出于后之人。欲从其书中,搜寻某一人所独有之说,几于无从措手;而一家之学,则其言大抵从同。故欲分别其说属于某人甚难,而欲分别其说属于某家则甚易。”^⑦

先秦儒家是一个整体,但其思想、学说的形成与完善则经过了一个比较漫

① [德]卡尔·雅斯贝斯:《人的历史》,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40页。

② 《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以下引文,版本同此)

③ 参见张以仁:《国语研究》,转引自张素卿:《左传称诗研究·绪论》,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1年版,第2页。

④ 详见张素卿:《左传称诗研究》,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1年版,第80、109、151、141、143页。

⑤ 参见朱金发:《先秦诗经学》,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1页。

⑥ 参见朱金发:《先秦诗经学》,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9页。

⑦ 参见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

长、曲折的过程：孔子创始之，孟子发展之，荀子集大成。“孔子本老聃之徒，传其文学于子夏，传《易》于商瞿。子夏传《诗》，五传而及荀子。商瞿传《易》，再传而及荀子。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为作《传》，丘明又六传而及荀子。故荀子于学最邃，于孔子之传最真，是以其书详于《诗》、《礼》、《乐》、《易》、《春秋》，复称引《道经》、《黄帝金人铭》，则其称五帝三代之传人传政，必确信无疑，而况夫其与孔子、庄子之言，初无二致哉。”^①儒学著述先后呈递，其经典著作《论语》、《孟子》、《荀子》由语录体、对话体发展为篇章结构相对完备的专题议论文，比较能概括自春秋至战国整个先秦时期散文的发展历史，诚如著名学者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所描述的。他把中国古代书籍分为“经”、“论”、“律”三类，曰：“一曰文言，藻绘成文，复杂以骈语韵文，以便记诵，如《易经》六十四卦及《诗》、《书》两经是也；是即佛书之经类。一曰语，或为记事之文，或为论难之文，用单行之语，而不杂以骈俪之词，如《春秋》、《论语》及诸子之书是也；是即佛书之论类。一曰例，明法布令，语简事赅，以便民庶之遵行，如《周礼》、《仪礼》、《礼记》是也；是即佛书之律类。后世以降，排偶之文，皆经类也；单行之文，皆论类也；会典、律例诸书，皆律类也。故经、论、律三类，可以该古今文体之全。”^②并强调诸子之文于中国文学的发轫作用：“中国文学，至周末而臻极盛。庄、列之深远，苏、张之纵横，韩非之排纂，荀、吕之平易，皆为后世文章之祖。……惟文学臻于极盛，故周末诸子，卒以文词之美，得后世文士之保持，而流传勿失。则修词学乌可不讲哉？”^③刘师培对中国古代书籍的描述非常契合先秦儒学著述的情况。他说：“如果将‘文言’看作是以‘言语’为主，‘语’是由‘言语’发展而成的‘语言’，大体符合古代汉语发展的实际情况。《易》之卦、爻辞实际上是巫师口语的记录，《诗》之主体《风》诗也主要是民间男女口头歌谣的记录，而《书》也多是口头发表的训诰（周、商以远之《书》实由西周以后史家整理或补写的）。如果说，以‘言语’为主要特征的口头文学（以文字记录时已作了一定的语言规范），是中国文学发端的话，那么，由‘言语’而进步到具有明显‘能指’、‘所指’意义的语言，中国文学就进入了正规的发展阶段。”^④

①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②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9页。

③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0页。

④ 陈良运：《周易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页。

鉴于此,本书的先秦儒家修辞^①研究将肇始于孔子,终结于荀子。通过对先秦儒学著述中修辞思想、修辞观点的梳理,通过对孔子、孟子、荀子言语修辞美学以及言语风格的分析,探求先秦儒家修辞的全貌。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孔子曾周游列国,晚年从事讲学和著述,整理、编订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他创建了儒家学派,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也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的政治主张、教育思想、语言修辞观点主要见于《论语》各篇,儒家其他典籍如《春秋》、《左传》、《礼记》、《大戴礼记》以及诸子著作、《韩诗外传》、《说苑》、《新序》、《孔子家语》、《孔子集语》等也有记载。

孟子(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城)人。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后游历梁(魏)、齐、宋、邹、薛、鲁、滕诸国,并一度仕齐为卿。后因道不行志不得,退而授徒著书,与公孙丑、万章之徒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②。他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是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师,被尊奉为“亚圣”。他的政治主张、哲学思想、修辞观点皆记载于《孟子》七篇中。

荀子(前313~前238年),名况,又称荀卿,战国末期赵国(今山西安泽)人。他曾游齐、秦、楚诸国,并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三为祭酒”、“最为老师”。同孔子、孟子一样,最后也是授徒著书以终。荀子生活于战国末期,晚于孟子近70年,他在继承孔孟学说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其他学派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儒家学派的理论,是先秦诸子的集大成者,战国末年的大思想家,儒家学派的殿军性人物。他的政治主张、哲学思想和修辞观点主要记载于《荀子》一书中。

从他们的生平看,孔子、孟子、荀子分别生活于先秦早、中、晚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分别代表了儒学的创立、完善、成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语言运用的日益娴熟看,孔子、孟子、荀子也颇有代表性,他们的言语由纯语录体发展为对话式论辩文和专题议论文,在选词、组句、设格、谋篇等语言表达手段的运用上发生了极大变化,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① 修辞,通常有三个含义:一是指修辞现象;二是指修辞活动;三是指修辞的科学,即关于修辞的知识、学说。所以在具体运用中,修辞的指称有所不同。如“孔子与修辞缘起”中的“修辞”指修辞的有关知识、学说等,“儒家修辞”、“道家修辞”、“墨家修辞”、“法家修辞”中的“修辞”则包括修辞学说、修辞现象、修辞活动等多层意思。为行文方便,本书将不再逐一说明。

②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以下引文,版本同此)

特色。匡亚明先生在论及孔子研究缘始时说：“以孔子为起点，是通过研究孔子，从纵的方面追溯研究前代情况一个最恰当的选择”，“以孔子为起点，是通过研究孔子，从横的方面研究诸子百家一个最恰当的选择”。^① 的确如此。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孔子都是影响最深最广的人物，他集以往文化思想之大成，又开后世儒家学说之先声；孟子承上启下；荀子则是儒家学说的殿军人物，他传承、发展了儒家的思想学说。所以，通过先秦儒家修辞的研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先秦儒家在中国修辞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

在“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游说盛行，论辩蔚成风气，修辞方法与技巧得以广泛应用，修辞理论得以迅速产生。为了游说的成功、辩论的获胜，诸子百家、纵横策士都积极、自觉地修饰自己的话语：注意言说的语气、语调，注意辩说的方法、技巧，讲求表意的准确、论证的充分和逻辑的严谨。无一例外。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辩论争鸣中，许多修辞手法如比喻、引用、对比、反问、设问、对偶、排比、顶真、反复等都得到了频繁运用，其作用都得到了充分发挥。理论来源于实践。修辞手法的运用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各家弘扬思想学说的要求，同时，它们的频繁运用又形成了一定的运用规律，规律又为人们如何更好地运用修辞提供了方法论指导。鉴于此，先秦时期的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都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修辞见解，如孔子提出了“修辞立其诚”、“情欲信，辞欲巧”、“辞达而已矣”等；孟子提出了“言近而指远”、“知言养气”、“以意逆志”等，荀子提出了“君子必辩”、“言有坛宇”、“言而当”、“言有节”等；老子提出了“言有宗”、“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等，庄子提出了“寓言、重言和卮言”等；墨子认为言“必立仪”、“言有三表”、“言之时”等；韩非在实用功利思想指导下，“好质而恶饰”，主张言辞要“以功用为之的轂”；等等。诸子各家的修辞见解、修辞观点虽然都夹杂在他们的哲学、政治、逻辑、论辩等阐述中，零碎分散，但都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中国修辞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儒、道、墨、法等不同学派的修辞见解、修辞观点，都是先秦时期的修辞思想。由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哲学见解，儒、道、墨、法各家对修辞有关问题的认识

^① 匡亚明：《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2页。

则有同有异。比如,他们都认为修辞不可或缺,修辞必须适应具体时间、场合、对象,修辞具有强大的社会政治伦理功能等,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相同或相通。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存在许多不尽一致甚至截然相反之处。如关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孔子主张“情欲信,辞欲巧”,讲求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墨子则主张“先质而后文”,先内容后形式;韩非则“好质而恶饰”,重内容反形式;等等。众所周知,一切的写说都有特定的动机和目的,都要表达一定的思想内容,而所有的思想内容都要依托于语言文字,通过语言文字的组合表达出来。思想内容与语言表达形式如果和谐统一、契合一致,就能够顺利完成交际任务;否则,就会造成内容与形式在某种程度上的偏离(故意造成内容与形式的偏离则是一种艺术化的修辞手段,不在此列),要么词不达意,引起误解,要么佶屈聱牙,艰涩难懂,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语言的说服力、感染力。如此看来,儒家的“情信辞巧”观点最为全面、合理和科学,这也正是儒家两千多年来一直主导中国文艺学、修辞学发展走向,成为中国文艺学、修辞学核心内容的关键所在。对此,袁晖、宗廷虎先生评价说:“儒家修辞思想是先秦修辞思想的主要代表。”^①

儒家主张“情信辞巧”,对言语表达提出了明确要求。另外,在修辞态度、言说心理、言说原则、话语理解等方面,儒家也都提出了精辟见解。孔子认为,人说话前应先平静心绪,“易其心而后语”。心态平和,说话的语气、语调才会平和,说出的话才会不偏不倚,持守中正。孔子主张“度主而谏之”,先弄清听者的心理然后再建言献策,效果会更好。交际由言说主体和接受主体双方共同参与,如果不知道听者的心理需求,仅凭个人的愿望和喜好,就会“话不投机半句多”。因此,孔子、孟子都提出了“知言”主张。孔子认为,不能正确理解话语就不能正确了解这个人,“不知言,无以知人”。孟子则特别擅长“知言”,并因“知言”在论辩中屡屡获胜。至于如何“知言”,孟子和荀子则分别提出了“以意逆志”、“解蔽”等方法。言说要兼顾表达和接受两端,还要注意方式方法,适应特定的时间、地点、场合和对象。关于时机和场合,孔子和荀子分别从言语实践中总结出不合时宜的“躁”、“隐”、“瞽”等弊端,希望人们言说、论辩要合宜得体。不一而足。孔子、孟子、荀子对修辞功用、修辞原则、修辞内容与形式、修辞理解、修辞态度等的一系列看法,已经涉及修辞活动的全过程,并相互补充、融合,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儒家修辞思想体系。

① 袁晖、宗廷虎:《汉语修辞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三

目前,学界的儒家修辞研究还有待系统、深入和全面。迄今为止,学界的儒家修辞研究存在“四多四少”现象,即对先秦儒家修辞观点、修辞技巧的单人分析多,对儒家学派的整体研究少;对先秦儒学著作的修辞技巧分析多,对其修辞观点的研究少;对儒、墨、道、法修辞思想、修辞手法的独立研究多,对他们相互间的比较研究少;单篇论文多,学术专著少。对先秦儒家修辞进行个体分析和整体论述的,有单篇论文、硕士论文、修辞学专著与修辞学史著作等。单篇论文或就儒家个体的修辞观点、修辞思想或语言艺术特色进行研究探讨,或就儒家与其他学派的修辞观之异同作了初步比较。硕士论文主要是儒家典籍的专书修辞研究。池昌海的《先秦儒家修辞要论》一书主要对儒家修辞思想与修辞行为进行了研究;郑子瑜的《中国修辞学史稿》,易蒲、李金苓的《汉语修辞学史纲》,袁晖、宗廷虎主编的《汉语修辞学史》,周振甫的《中国修辞学史》,吴礼权的《中国修辞哲学史》以及陈光磊、王俊衡的《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等修辞学史著作,主要对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的修辞思想及先秦儒家经典中的修辞观点作了简要概括和梳理。本书拟从修辞理论与修辞实践两个维度探讨儒家的修辞特色与成就。

从远古修辞意识的萌生到现在,中国修辞学经过两千多年的不断发展,如今已成为一门内容充实、理论丰富、体系完备的重要学科,并在人际间的交往、国家的安定团结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实和历史紧密相连,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和发展,历史是现实的源头和基础。先秦儒家丰富的修辞理论和修辞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高贵财富,我们必须“鉴往知来”,对它们进行全面、深入的挖掘和研究,以更好地古为今用,推动中国修辞学的进步和发展。正如易蒲、李金苓先生所说:“古代有关修辞的论述,虽然探讨的是早已逝去了的史实,但却能大大影响今天的修辞学研究。不了解历史上修辞理论、修辞手法的源头及其发展演变的轨迹,也就不能正确认识今天的修辞论述,更难以把它们进一步推向前进。创新和开拓,必须牢牢建筑在继承前人优秀遗产的基础上。只有‘继往’才能‘开来’,唯有根深才能叶茂。”^①“古为今用”、“继往开来”,正是我们研究儒家修辞的初衷之所在。

① 易蒲、李金苓:《汉语修辞学史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第一章 先秦儒家与修辞

我们今天所说的“修辞”，最早见于《周易·乾·文言》：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①

上古时期，汉语多单音节词，即“修”是“修”，“辞”是“辞”，上文中的“修辞”是一个词组而并非一个词。那么，是谁最早把“修”与“辞”二字连用的呢？连用后的“修辞”作何解释？它与现代学科名称“修辞”又是怎样一种关系？本章拟通过《易传》作者的考察、“修辞”语义内涵的分析，对上述问题作出明确解答。

第一节 孔子与修辞缘起

一、孔子与《易传》

《周易》分经、传两个部分。经是古人占筮的记录，由卦和辞构成；传是经的解说，共有《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七种十篇，旧称《十翼》。关于《易传》的作者及成书时间，许多学者作了详细考证，普遍认为《易传》各篇并非成于一时，但都不晚于战国时期；其作者并非一人，而

^① 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以下引文，版本同此）

是由孔子及其弟子集体完成。至于《十翼》中《文言》、《系辞》篇的作者,历代看法不一,众说纷纭。如司马迁、班固等认为,《文言》、《系辞》篇系孔子所撰^①;欧阳修则持怀疑态度,认为《系辞》、《文言》、《说卦》、《杂卦》等皆非孔子所作^②;李镜池先生认为,孔子作《易》是一种传说^③;郭沫若先生认为,其是荀子的门徒所撰^④;金景芳先生认为,《文言》全部是孔子及其弟子所撰^⑤;等等。各有所据,莫衷一是。

孔子曾学习、研读过《周易》。他曾自述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⑥朱熹注曰:“学《易》则明乎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故可以无大过。盖圣人深见《易》道之无穷,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学,而又不可以易而学也。”^⑦孔子一生仕途坎坷,屡不得志,发此慨叹,大概他已认识到了《周易》的不可不学、不可不早学。孔子不仅学《易》,而且到了“韦编三绝”的程度。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⑧

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足见他于《易》已了如指掌,烂熟于心,造诣相当深厚。众所周知,一个人只有对某一对象有了深切了解、参透了其中真谛之后,才能对它有所感悟、有所阐发,才能为之作序。孔子能够“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能够“正《易传》,继《春秋》”^⑨,充分说明孔子对《周易》的研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司马迁、班固均乃史学名家,又距《易

①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班固《汉书·艺文志》:“文王……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王充《论衡·谢短篇》:“孔子作《彖》、《象》、《系辞》。”

② 欧阳修《易童子问》:“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唐宋八大家散文全集·欧阳修散文全集》(上),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

③ 李镜池《易传探源》:“《文言》解《乾》,共有四说,而互有异同。《系辞》上下,杂乱繁芜,显然是汇合诸作,不出一人。不知起初造孔子传《易》之说的人何以这样不高明,这样失检?于此可以看出‘孔子传《易》’实是一种传说。”(李镜池:《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95页)

④ 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大抵《彖》、《系辞》、《文言》三种是荀子的门徒在秦的统治期间所写出来的东西。”(郭沫若:《郭沫若全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1页)

⑤ 金景芳《关于周易的作者问题》:“《文言》全部……应为诸弟子在平日孔子讲述时,所作的记录。”(金景芳:《学易四种》,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17页)

⑥ 杨伯峻:《论语译注·述而》,(香港)中华书局1984年版。(以下引文,版本同此)

⑦ 朱熹:《论语集注》,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67页。

⑧ 《史记·孔子世家》。

⑨ 《史记·太史公自序》。

传》成书时间最近,所言当有所依。因此李学勤先生在《周易经传溯源》中指出,孔子定《易》肯定不是说他们仅仅读过《易》,否则,就不能用一“定”字。^①但《易传》十篇是否都为孔子所作,后世见解歧异,争论不休。我们赞同这种观点,即孔子与《易传》有着十分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今本《易传》的各个部分都与孔子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②《易传》十篇绝非孔子一人所作,而是出自孔子弟子及其后学之手,其中《文言》、《系辞》两篇则由孔子弟子记录、整理而成。

二、“子曰”即“孔子曰”

今本《易传》的《文言》、《系辞》篇中多处出现了“子曰”二字,据黄沛荣先生统计,原见于今本《易传》之《系辞》、《文言》二传引称“子曰”者达30条;而新出帛书《易》中的《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繆和》、《昭力》5篇引称“子曰”、“孔子曰”、“夫子曰”者达105条。即使扣除认定上尚有争议的若干条,为数也相当可观。^③“孔子”、“夫子”所指自是无疑,“子曰”是否“孔子曰”呢?欧阳修认为,《易传》“‘子曰’者,讲师之言也”^④。对欧阳修的这一观点,后世学者有的赞同,有的反对。赞同者认为,“子”指孔子;反对者认为,“子”不独指孔子,还指其他诸子、学者。我们认为,《易传》“子曰”中的“子”就是指“孔子”。

在古代,“子”是男子的通称。春秋以后,执政之卿称“子”;后来,对学者所宗之人也称“子”,如孔子、墨子等。钱穆则认为:“孔子为鲁司寇,其门人称之为曰子。称子不成辞则曰夫子。”^⑤所以,《论语》等儒家文献中的“子曰”或“夫子曰”中的“子”都专指孔子,其他人称“子”则冠以姓,如曾子、有子、子墨子等。对此,邢昺早有辨析。何晏《论语集解》引马融语:“子者,男子之通称,谓孔子也。”邢昺注曰:“云‘子者,男子之通称’者,经传凡敌者相谓皆言吾子,或直言子,称师亦曰子,是子者,男子有德之通称也。云‘谓孔子’者,嫌为他师,故辨之。《公羊传》曰:‘子沈子曰。’何休云:‘沈子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师也。’然则书传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圣德著闻,师范来世,不须言其氏,人尽知其故也。若其他传受师说,后人称其

① 参见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

② 郭沂:《〈易传〉成书与性质若干观点评议》,《齐鲁学刊》1998年第1期。

③ 参见黄沛荣:《易学乾坤·孔子与周易经传之关系》,大安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208页。

④ 欧阳修:《易童子问》,《唐宋八大家散文全集·欧阳修散文全集》(上),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

⑤ 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页。

先师之言，则以子冠氏上，所以明其为师也。‘子公羊子’、‘子沈子’之类是也。若非己师，而称他有德者，则不以子冠氏上，直言某子，若‘高子’、‘孟子’之类是也。”^①

《易传》中的“子曰”乃孔子所言，还可从《易传》本身证明。《周易·系辞下》：“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孔子对颜渊的这种评论，与《论语》所载孔子对颜渊“回也其庶乎”（《先进》）、“不贰过”（《雍也》）的评价是一致的。另外，这段文字还见诸帛书《要》。《要》称之“夫子曰”，其下则记载了“夫子”与“子贡”的对话。子贡是孔子的弟子，这说明：“《系辞》和《文言》的‘子曰’当为‘孔子曰’。说它们是‘讲师之言’，否定它们为孔子之说，经不起出土文献的检验。”^②廖名春先生的这一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著名学者金景芳先生在作了详细考证后说：“《文言》全部……应为诸弟子在平日孔子讲述时，所作的记录。”^③就像由孔子弟子记录、整理的《论语》其中的“子曰”都是“孔子曰”一样，《文言》篇既然也由孔子弟子记录、整理，其中的“子曰”也当是“孔子曰”。对此，台湾学者胡自逢在《孔子解〈易〉十九则述要》^④、香港学者邓立光在《从帛书〈易传〉考察“文言”的实义》^⑤中也都认为《文言》、《系辞》篇中的“子曰”是“孔子曰”。

《易传》中的“子曰”既然是“孔子曰”，那么毫无疑问，孔子是最早把“修”、“辞”二字连用的人。

第二节 《易传》“修辞”的语义内涵

与现代的“修辞”不同，在古代，“修”是“修”，“辞”是“辞”，是各自独立的两个词。孔子最早把“修”与“辞”二字连用在一起。

在解释《周易·乾》九三爻“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时，孔子把“修”与“辞”二字连用在了一起，曰“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关于“修辞”的含义，

① 何晏集解，邢昺疏，梁艳华整理：《论语注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② 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页。

③ 金景芳：《关于周易的作者问题》，《学易四种》，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17页。

④ 胡自逢：《孔子解〈易〉十九则述要》，《周易研究》1999年第3期。

⑤ 邓立光：《从帛书〈易传〉考察“文言”的实义》，《周易研究》2002年第4期。

后世的经学家、易学家、文论家、语言学家、修辞学家等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说解、阐释,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

一、众说纷纭的《易传》“修辞”

考察历代学者对《易传》“修辞”的解释,我们发现,“修理文教”说、“修饰言辞”说、“修省言辞”说和“立言”、“作文”说是四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

1. “修理文教”说。孔颖达从礼乐教化的角度把“辞”疏解为文教,他说:“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①这种说解影响最深、最广,很多学者以此为据,认为修辞就是修理文教。

2. “修饰言辞”说。从古至今,持此种观点的最多。如黄寿祺、张善文在译注“修辞立其诚”一语时说:“君子要增进美德、营修功业。忠诚信实,就可以增进美德;修饰言辞出于诚挚的感情,就可以积蓄功业。”^②徐子宏也把“修辞”解释为“修饰言辞”。^③

3. “修省言辞”说。此说主要以宋代理学家程颢、朱熹等为代表。《周易折中》引程子曰:“‘修辞立其诚’,不可不予细理会。言能修省言辞,便是要立诚。若只是修饰言辞为心,只是为伪也。修其言辞,正为立己之诚意。”朱熹亦云:“修省言辞,诚所以立也;修饰言辞,伪所以增也。”^④

4. “立言”、“作文”说。把“修辞”解为“立言”或“作文”,实际上是对修饰言辞的一种简化。如尚秉和在《周易尚氏学》中说:“修辞者,立言也。”^⑤

经学家、易学家对“修辞”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到语言学家、修辞学家们对“修辞”的认识;而语言学家、修辞学家对“修辞”的不同认识,则直接关系到《易传》“修辞”与学科名称“修辞”的关系问题,即“修辞立其诚”的“修辞”是否为“修辞”学科的源头问题。那么,“修”是“修理”、“修饰”还是“修省”?“辞”指“文教”还是“言辞”?“文教”与“言辞”、“文辞”有无关系?明了这些问题,是我们正确理解“修辞”含义的关键。而《易传》“修辞”含义的确定,又是我们能否确定它为学科名称“修辞”源头的关键。

① 孔颖达:《周易正义》,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②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③ 参见徐子宏:《周易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④ 朱熹:《答吕子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七,《四部丛刊》本。

⑤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页。